

专题栏目:新质生产力与高质量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政治经济学阐释

翟 青¹, 曹守新²

(1. 鲁东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烟台 264025; 2.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2488)

摘 要: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为理解新质生产力概念奠定了理论基础。新质生产力是物质生产力与精神生产力、改造自然与社会进步协调一致的多维度突破跃升,体现生产的技术方式与组织方式协同演进的系统性变迁。在生产要素构成层面,新质生产力是指新型生产要素出现、原有生产要素的供给质量提升,以及各要素组合的配置效率改善;在产品和产业形态层面,新质生产力是指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要的产品供给能力提升以及产业结构实现转型升级。重大科技创新的驱动引领,构成新质生产力的突出内核,并赋予其鲜明的高质量发展特征。当前,影响制约新质生产力的主要难题,集中表现为重大科技创新的核心动能不足、宏观经济治理面临两难困境以及世界格局动荡变革的外部冲击。新时代新征程,要以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建设数实融合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发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治理效能,作为加快推进新质生产力的政策优先项与着力点。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重大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中图分类号:F014.1: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7454(2024)02-0015-09

引用格式:翟青,曹守新.新质生产力的政治经济学阐释[J].西安财经大学学报,2024,37(2):15-23.

Citation Form:ZHAI Qing, CAO Shouxin. A political economy explanation of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J]. Journal of Xi'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24, 37(2): 15-23.

一、引言

2023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省考察时强调:“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1]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阐述,为党和国家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赢得战略先机,以高质量发展助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提供了重要遵循。

作为一个崭新的概念,新质生产力是什么?与传统生产力相比较,其究竟“新”在何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的出场背景与时代价值何在?其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存在怎样的逻辑关联?新时代新征程如何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围绕上述问题,理论界作了颇具成效的探索,形成了一批代表性成果。如蒲清平等认为,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内核,由“高素质”劳动者、“新介质”劳动资料和“新料质”劳动对象联结而成,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阵地,以高质量发展为旨归,适应新时代、新经济、新产业的生产力的高级形态。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从生产力的质量、要素和跃升三个方面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2]。周文等则将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所产生的更强劲的创新驱动力归结为新质生产力的内核,并建议把政府与市场的有机结合、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健全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培

收稿日期:2023-12-1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道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与历史经验研究”(20&ZD05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经济发展思想与当代价值”(20YJC710080)

作者简介:翟青(1982-),男,山东潍坊人,鲁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曹守新(通讯作者)(1980-),男,山东济南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山东社会科学》编审,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与谋划未来产业等作为政策实施的重要着力点^[3]。周绍东和胡华杰提出,生产力的量变与质变是生产力复杂系统内主客体因素、生产方式等多要素协同演变的过程,规模庞大的国内市场是孕育新质生产力的量变基础,高质量劳动力是关键要素^[4]。谢璐和韩文龙认为,新质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重要表现形式,其通过牵引效应、结构效应、乘数效应和增长效应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5]。此外,也有学者尝试构建新质生产力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对中国新质生产力的总体发展趋势和省域间差异进行量化测度^[6]。

概括而言,已有研究对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时代背景、影响机制和实践路径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初步搭建了研究的总体框架和学理基础。但相关研究仍有继续深入的空间:一是要在精准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对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作出阐释。当前研究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由于理论界对生产力的概念、构成要素以及科学技术是否作为生产力中的独立要素仍存有较大分歧,导致对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界定存在偏差。二是有待进一步拓宽研究视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生产力的研究,不但需要深入到生产力诸要素的功能、结构、组合方式层面,而且需要紧密联系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上层建筑等展开。如学者们一致认可新质生产力蕴含的科技创新特质,尤其强调关键技术创新的主导作用,但一定程度上却窄化了对创新的理解,忽视了生产组织创新乃至制度创新在其中的作用。三是有待进一步完善研究方法。一方面,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是量变与质变的辩证统一,不可忽视量的积累与准备而单纯强调质的飞跃;另一方面,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新质代替旧质的过程是在矛盾对立统一作用下实现的,唯有找准影响制约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矛盾焦点和突出问题,才能针对性提出实践对策的优先项和发力点。

鉴于此,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对新质生产力进行系统阐释,无论是对推动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学理化研究,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话语体系,还是对助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基础: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

生产力是人类社会进步和制度变迁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概念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大厦的基石。马克思对生产力的内涵和构成要素作了深刻论述,完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生产力理论的基础建构。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新质生产力在理论创新与中国式现代化具体实践的结合中得以生成。

(一)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内涵的多维阐释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从多个角度、不同侧面对生产力的内涵作了阐释,并使用了诸如“物质生产力”“劳动的生产力”“社会劳动的生产力”“直接的生产力”等多种称谓。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相关论述的具体涵义,把握这些不同称谓背后的共同本质,是学习和运用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首要前提。

在政治经济学中,生产力首先是一种人们进行物质资料生产的客观力量,即物质生产力。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7]在一般意义上,生产力主要是指客观物质力量,强调生产力是历史进程中归根结底性的决定因素,也正是基于物质生产力的含义来阐述说明的。但生产力不仅是人们生产物质财富的客观力量,也是人们生产精神财富的能力,即以一般智力和知识形态存在的精神生产力。马克思明确提到,货币作为生产要素与雇佣劳动相结合,是“发展一切生产力即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主动轮”^[8]。围绕物质生产力与精神生产力的相互关系,马克思指出:“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大的程度上被生产出来,不但在知识形态上,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社会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9]198}在这里,马克思强调,以自然科学为代表的一般社会知识不断被应用到社会实践中,转化为固定资本形态的直接的客观物质力量,物化为社会生产生活的“直接器官”。精神生产力的能动性使其从一种潜力的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从而在一定意义上具有相对独立性。而不管是物质生产力还是精神生产力,都内在统一于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之中。

生产力也是人们利用改造自然的实践水平与自身需要得以满足实现的统一。无论是物质财富生产还是精神财富生产,都体现着人们利用、改造甚至保护自然的实践能力水平,但这种能力水平不过是作为中间手段而非最终目的。生产力的发展内在包含着不断满足人们自身需要的诉求导向。马克思强调:“生产力当然

始终是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10]59}这不仅表明,生产力与劳动生产力在概念内涵上是相通的、高度一致的,生产力的存在以具体劳动创造的使用价值为根本内容,而且意味着社会成员的需要满足程度是评价衡量其实践能力高低的标准,生产力发展无疑要同人们的物质文化等多样化需要相符合。

(二) 马克思对生产力构成要素的论述

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依赖于各生产要素的供给状况,而生产要素供给的数量和质量直接表征着生产力的层次水平。马克思明确指出:“生产力即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11] 生产力是一个由多要素构成并相互渗透影响的复杂系统。马克思分析了一般生产过程的基本要素,即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指出任何社会形式下的生产都是劳动者施加劳动资料于劳动对象之上的对象化活动。同时,马克思结合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发展现实,具体分析社会化大生产过程中原有要素的更新、新要素的加入以及新旧要素组合的变化。马克思具体说明了决定劳动生产力状况的诸多因素:“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的应用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10]53} 无疑,生产力的构成要素是多方面的,除了一般劳动过程的三大基本要素外,还包括科学技术的发明应用、分工协作、组织管理和自然条件等。

在生产力系统中,诸要素功能属性的发挥、结构状态的变化,自然会引起生产力总体水平的变化。其中,科学技术发挥着日益明显的引领和驱动作用。科学技术不仅是渗透或改造其他诸要素的主导变量,而且作为以知识形态存在的生产过程的智力因素,越来越超前于生产,从而构成一种相对独立的生产力要素。马克思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在生产力要素中的地位 and 作用,不仅明确讲到“资本的趋势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从而“生产力中也包含科学”^{[9]188},而且研判了生产力发展的趋势性特征:“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而是取决于科学的一般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这种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9]195-196}

生产力系统中诸要素的关系并非仅仅是一种机械式的简单排列,而是相互间共生互嵌、融合渗透的有机组合。在马克思看来,这一有机组合是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通过分工协作、组织管理等非实体性要素作用于实体性要素,从而导致“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优化的结果。

马克思将分工协作视为生产力中不可或缺的要害。一方面,分工以产业间一般分工、产业内特殊分工和企业内个别分工的形式展开,随着分工程度的深化与范围的扩大,生产过程被分解为一系列专业化、复杂化的工序环节,并伴随新产品、新产业部门的涌现,引起生产力水平发生质变;另一方面,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能够摆脱个人生产力的局限,激发劳动者的竞争潜能和种属能力,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从而创造出超越个人生产力的新的“集体力”,马克思将其称为“社会劳动的生产力”^{[10]382}。由于分工协作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下日益密切,劳动者之间、区域行业之间、企业组织内部各要素之间呈现愈加明显的生产社会化趋势,而生产社会化趋势又内在要求生产的组织管理形式与之相同步、相适应。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专门论述了以机器体系为中心的工厂制度逐步代替个人技能操作为主体的手工工场,并将工厂运行制度中的管理劳动比作乐队的总指挥,强调在规模庞大的机器工业生产中,从事这种指挥、管理、组织、协调的工作,能够加强生产过程的计划性与合理性,是资本确保生产有序进行并最终攫取剩余价值的必要职能。

三、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与核心要义

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及其要素的科学阐释,为我们理解把握新质生产力的概念提供了理论参照和方法依据。基于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内容,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我们认为,新质生产力是一个内涵丰富、内核突出、特征鲜明的经济学范畴。

(一) 新质生产力的丰富内涵

在构词上,新质生产力是由“新质”和“生产力”这两个概念组成。所谓“新质”,是指与“旧质”相对应,体现事物根本性质的改变、质态规定的更新,蕴含着新事物取代旧事物的前进性、上升性态势;“新质”与“生产力”二者的概念合成,从字面意义上看,意指新兴的、升级的、先进的生产力,标志着生产力总体水平实现突破跃升的全新状态。在此,依据上述对马克思生产力概念的理解,首先可以对新质生产力的概念作出如下定义:新质生产力不仅是人们物质资料生产能力的飞跃,而且包含着人们精神财富创造能力的飞跃;它不仅体

现人们控制、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实践水平跃升,而且体现人们美好生活需要得以满足和实现程度的跃升。总而言之,新质生产力是物质生产力与精神生产力、改造自然与社会进步协调一致的多维度突破跃升。

需要指出的是,关于新质生产力是物质生产力与精神生产力、改造自然与社会进步协调一致的多维度突破跃升的界定,仍然停留在思维行程的抽象层面,远未达成对其丰富规定性的完整叙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以相对简单的规定性为叙述起点,逐渐赋予研究对象以更复杂的规定性,从而在思维行程中再现事物多样性的统一,是构建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方法。对于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同样需要遵循上述方法,将最抽象的规定性延伸开来,揭示这一概念多方面的具体规定性。

我们进一步从生产要素构成以及产品和产业形态两大层面展开对新质生产力内涵的具体阐释。在生产要素构成层面,新质生产力是指新型生产要素出现、原有生产要素的供给质量提升以及各要素组合的配置效率改善。在产品和产业形态层面,新质生产力是指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要的产品供给能力提升以及产业结构实现转型升级。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视角出发,无论是生产要素构成层面,还是产品和产业形态层面,新质生产力实质上是生产的技术方式与组织方式协同演进的系统性变迁。

从生产要素构成层面看,首先,新型生产要素出现。新型生产要素的出现是科技创新的直接结果。以知识为例,知识作为一种独立于传统的劳动、土地、资本、管理之外的新型生产要素,本身就是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相对独立要素的现实反映。实际经济活动中,人们也往往把新技术视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下,生产要素的范围逐渐扩展、类型不断分化。当今时代,在现代信息科学发展的基础上,围绕数据收集、生成、存储、分析、计算、流通的数字技术体系得到广泛应用,大数据或数字化信息正成为新型关键生产要素,在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生产力发展正进入数字生产力时代。

其次,原有生产要素的供给质量提升。新科技的传播应用,通过对原有生产要素的改造渗透使其以全新的质态呈现。例如,就劳动者而言,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不断增强,劳动复杂程度不断提高,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的人才红利得到更好发挥;就劳动资料而言,指生产的动力系统、传动系统、执行系统和控制系统不断迭代升级,机器设备趋于高精尖化,基础设施更加先进完备,信息通讯手段更加高效便捷;就劳动对象而言,指原材料的精细度更高、品质更稳定耐用,自然物得到更充分开发利用等。

最后,各要素组合的配置效率改善。一方面,生产的技术变革为各要素组合提供新的链接工具、手段。例如,新技术革命的深入推进,提升了劳动者的数字化技能,拓展出非物质领域的数字空间,提供了智能化的机器设备,催生了新型复合化、智能化材料,加快了对太空、深海、深地等自然界新能源的开发,从而各个要素相互组合的技术方式得以改进,产生资源重新配置效应。另一方面,生产的组织管理变革为各要素组合提供新的运行载体、渠道。工业革命以来,从最初的机械化工厂到基于自动化流水线的福特主义的大规模标准化生产与泰勒制管理,再到基于产业链价值链的后福特主义的弹性生产与模块化管理,生产的组织管理模式不断发生变革。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的应用,大规模多样化生产正在成为现实,“无人工厂”与“虚拟车间”重塑劳动过程^[12],平台成为组织生产的重要中介,供应链的网络协同性、生产与消费对接的精准及时性、各产业部门运行的组织计划性得到明显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得到大幅提升。

从产品和产业形态层面看,其一,与人们美好生活需要相匹配的产品供给能力提升。新技术、新要素的出现必然伴随着新产品的涌现,而新产品的大规模供给是以满足市场需要的价值实现为条件的。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们的需求结构由生存型向发展型、享受型转变,更加注重产品的高质量、生活的高品质,而且在物质生活必需品之外,对数字化信息化产品、生态绿色产品、健康养老型服务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在生产目的和结果层面,新质生产力与人们的需求结构转型所引致的产品供给水平紧密相关。在此意义上,从供给侧积极回应需求端变化,通过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实现供需两侧高水平动态平衡,既是新质生产力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衡量新质生产力“能力”高低的重要依据。

其二,产业结构实现转型升级。产业是生产单位的集合体,产业形态变迁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社会分工拓展深化的结果。人类社会从农耕时代迈入工业时代,进而迈入信息时代乃至未来的智能时代,时代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上不断涌现新产业,产业形态日益多样化、复杂化,产业结构趋于高级化。新质生产力是产业形态多样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趋势的延续深化,它意味着在现有产业基础上出现了新兴产业部门,这些新兴产业部门密集使用高技术含量的新型生产要素,大规模从事新产品的商业化供给,

形成新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同时,产业间的结构关系发生趋势性转变,传统的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渐下降,而战略性新兴产业日臻成熟、未来产业萌芽初显。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以关键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具有知识和技术密集度高、能源资源消耗少、融合渗透性强、发展潜力大的优点,二者蓬勃发展的上升势头会加快产业结构的更新换代与优化升级步伐,自然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

(二)新质生产力的突出内核与鲜明特征

新质生产力之所以能实现多维度的突破跃升,源于重大科技创新的驱动引领,这正是其超越传统生产力的突出内核。重大科技创新的内核驱动为新质生产力提供更强劲、更充足、更持久的动能,使其具备鲜明的高质量发展特征。

在此,笔者使用了“重大科技创新”而非“颠覆式技术创新”或“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等词汇,主要是出于避免割裂科学、技术与经济相互间日益紧密联系的考虑。熊彼特严格界定了“创新”的含义,认为新技术发明本身并非是一种创新活动,只有当企业家将新技术应用到生产经营活动之中并为企业带来实际利润,才能称之为“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创新概念既涉及以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为主要形式的技术创新,又涉及发现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理论创新,也涉及生产组织变革引发的制度创新。其中,科技创新主要是指以自然科学进步为基础的新技术发明及其应用,是包含基础理论研究—基础应用研究—产业化在内的全周期创新过程。此外,在演化与创新经济学中,学者们往往将创新区分为激进型创新和渐进型创新两种类型。所谓激进型创新,是指实现从0到1突破、颠覆行业标准和竞争规则、蕴含巨大财富创造潜力的原始性创新;所谓渐进型创新,是指在原始创新基础上通过引进、消化和吸收,对既有生产要素进行重新整合融通,形成“1+1>2”效应的跟随式集成式创新。但从量变与质变的辩证关系看,在渐进型创新的过程中,新技术与传统产业的整合融通,也可能导致新的激进型创新的发生。新能源汽车的崛起无疑是一个生动的案例。因此,使用“重大科技创新”这一概念既涵盖激进型创新,同时包含着大量渐进型创新,体现量的积累与质的飞跃的动态统一。

重大科技创新的内核驱动作用在新质生产力中更加凸显。这一内核驱动作用首先体现在科学技术的自我发展趋势上。自第三次工业革命以来,一个明显的趋势是科学作为技术进步的活水源头,越来越成为技术创新的先导。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以前,技术创新更多依赖“干中学”的经验积累或商业前景的利益驱使,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关系相对疏远。第三次工业革命使得科学与技术的互动联系更加紧密,尤其是基础科学理论的重大发现在指导新技术发明中的作用愈发重要。同时,生产过程中的技术难题,会对现有技术轨道和技术路线提出挑战,进而推动科学理论的新突破。在现代社会分工中,科学技术研究已发展成为一套相对独立的专业化知识生产体系。

重大科技创新的内核驱动作用更突出体现为科学、技术与经济三者之间融合一体化的主流趋势^[13]。例如,如果没有量子力学的革命,就不可能诞生激光、核能、晶体管、芯片等信息通讯技术领域的创新蜂聚,也就不可能出现移动通讯、互联网、电子计算机、智能手机等一大批新兴产业部门的崛起。重大科技创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和直接竞争力的速度明显加快,对生产力整体构成要素的质量和效率起着决定性作用,促使产业形态和产业结构深刻变革,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加速器。着眼未来,包括核物理学、高分子化学、材料科学、生命科学、脑科学等在内的重大前沿科学发现,或将孕育以可控核聚变、量子计算、清洁能源、3D打印、人工智能、虚拟现实、DNA编辑等为标志的新一轮科技与产业变革,重大科技创新的未来走向为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新的重要机遇。

由重大科技创新驱动引领的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相比,呈现出鲜明的高质量发展特征。高质量发展是追求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动态同步,统筹实现发展与安全多元目标的有机统一^[14]。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源自重大科学发现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由此形成全新的能源材料、零部件、工艺流程、产品性能、产业形态、商业模式和应用场景,从而与高质量发展所追求的多元目标的有机统一高度契合。新质生产力能够摆脱对低成本劳动力和能源资源大量耗费的“路径依赖”,以数字化、智能化创新促进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效率变革、质量变革和动力变革;新质生产力通过调整优化要素组合、资源配置、空间布局、产业结构,推进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平衡协调;新质生产力重视资源节约和生态优先,将保护生产力作为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方

面,倡导绿色、低碳、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新质生产力不是在封闭保守的“脱钩断链”环境下生成,而是在构建新发展格局过程中,在开放、包容、竞争、合作中逐渐发展壮大;新质生产力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基础,能够加固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可靠性,增强发展的韧性,有利于我国在国际大变局中赢得战略主动和竞争先机;新质生产力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准绳,最终统一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服务落脚于民生福祉提高和共同富裕的实现。

四、制约新质生产力形成的主要难题

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制约新质生产力的主要难题集中表现为重大科技创新的核心动能不足、宏观经济治理面临两难困境以及世界格局动荡变革的外部冲击加剧。

(一)重大科技创新的核心动能不足

新质生产力的内核在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尤其是强化重大科技创新的战略支撑。目前,尽管我国科技实力显著增强,一些领域相继取得重大标志性成果。但总体而言,自主创新能力仍明显不足,很多关键设备、重要零部件和基础材料严重依赖进口,难以适应新质生产力对重大科技创新驱动的迫切需要。

重大科技创新动能不足的一个先决性因素是与基础研究相关的原始创新相对落后。2021年,中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研发经费总投入的比重仅为6.09%,与发达国家15%~20%的水平相比尚有较大差距,直接造成原始创新能力和底层通用技术开发能力欠缺,创新优势更多体现在商业应用和产业化阶段。特别是,企业开展基础研究的积极性严重不足,中国企业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比重不到5%,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企业普遍20%以上的水平^[15]。

重大科技创新动能不足对国民经济的产品结构、产业结构和产业安全造成严重影响。从产品结构看,中国企业生产的产品在制造精度、质量稳定性、性能档次、品牌知名度、消费者满意度等方面,与跨国垄断巨头相比存在较大差距。由于高品质、个性化、高附加值产品的供给能力不足,导致高端消费需求大量外流。从产业结构看,产业高端化程度有限,低端无效产能仍然大量过剩,相当数量的制造业企业利润微薄,在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产业链中处于“低端锁定”状态,数字经济赋能产业结构高端化能力亟待提升^[16]。从产业安全看,产业发展由于缺芯少核,关键技术、重要行业的对外依存度较高,随时面临被“卡脖子”或“断供断链”的风险,对国家经济安全造成重大隐患。

(二)宏观经济治理面临两难困境

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在推动生产力实现质的突破跃升的同时,也不可避免造成一些负面影响,即创造性破坏效应。这一创造性破坏效应,对市场竞争、劳动就业、劳资关系、收入分配等各领域的宏观经济治理带来新的挑战。

其一,数字技术能够显著提升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率,但少数龙头企业凭借技术优势独占庞大的数据资源,利用网络效应和规模效应,借助数字平台以中介抽成的方式攫取巨额租金,形成数字垄断格局^[17]。为维持垄断地位,垄断企业控制创新方向、逃避政府监管、肆意无序扩张,严重破坏市场竞争秩序,挤压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其二,数字化生产在赋予劳动者一定自由的同时,强化了算法和数据对劳动者的控制支配,并通过灵活众包、弹性就业等非雇佣方式将其裹挟进无保障工作之中。其三,智能化技术的应用在推动新产业扩张的过程中,造成传统产业广大中低端劳动者“去技能化”,对其就业产生强烈的替代效应。此外,数据要素的资本化能够激发财富创造的积极性,却造成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份额的相对下降,进一步拉大劳资之间以及劳动者内部的贫富分化趋势。

生产力水平的突破跃升,是一个新质同旧质相互并存、对立最终实现扬弃的复杂过程。面对新技术革命浪潮下的创造性破坏效应,一旦应对不当,往往会陷入两难困境,反过来影响制约新质生产力的成长壮大。如何处理好破与立、数量与质量、秩序与活力、传统与现代、发展与安全之间的对立统一,提升宏观经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检验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效能。

(三)世界格局动荡变革的外部冲击加剧

当前,世界格局进入新的大动荡大变革时期。大国博弈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国家全面升级对华围堵遏制,叠加全球经济长期低迷,中国面对的外部冲击骤然增多,未来中国发展或将经受严峻考验。

目前,美国对华战略遏制呈现全方位、多层次的特点,已形成遍及经贸、科技、金融、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军事等各个领域的“综合围剿”之势。美国政府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长臂管辖”和单边制裁,肆意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横加干涉中美之间的正常市场竞争和商业交易。据统计,美国迄今已将一千多个中国实体单位或个人列入制裁清单。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整体陷入经济持续低迷的长波下行周期,“逆全球化”“反全球化”“去中国化”等单边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潮泛起,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明显增多。进入21世纪,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带动世界格局发生“东升西降”的深刻变革,但这一变革尚未根本扭转“西强东弱”的固有等级结构,中国仍身处高度不平等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包围钳制之中^[18]。

五、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政策优先项与着力点

生产力系统内部诸要素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从这一方法论出发,要解决影响制约新质生产力形成的主要难题,关键是如何从政策导向和制度设计上把握实践对策的优先项与着力点。

(一)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

发挥举国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提升科技实力和应对科技竞争的重要经验。与促进科技发展的传统举国体制相比,新型举国体制是以发挥市场配置科技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为基础,通过国家综合实施科技、产业、税收、法律、行政等政策手段引导规范市场,从而在创新主体、创新资源、创新组织、创新动力等方面促进政府与市场的有机结合,最终攻克尖端领域和重大工程项目的科技工作运行机制。

当前,全球科技创新进入密集活跃期,新一代信息、生物、能源、材料、空间等领域革命性成果不断涌现。要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国家创新体系,使有限的人力、财力、物力和技术资源向前沿重大目标领域集中。应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科教兴国战略,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努力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原创性颠覆性成果的重大突破,推动前沿引领技术、通用共性技术和现代工程技术的突破创新。要促进重大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使创新覆盖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再到最终成果产业化和市场化的完整链条。要更加注重发挥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让企业成为科技创新主体,主要利用市场机制和经济手段解决科技创新工程的立项、决策、预算、利益分配等问题。要注重激发创新主体的活力,激励更多大科学家、领军人才、青年骨干和创新团队弘扬探索求实精神,在实干中创造科研业绩。

(二)建设数实融合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新技术革命浪潮下,产业发展的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趋势渐成主流,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成为数字经济时代产业发展的主要形态。建设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筑牢产业根基,是迎接数字革命浪潮的主动选择。

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推进重点领域数字产业发展,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谋划布局未来产业,努力开辟发展新赛道、赢得竞争新优势。打造高效智能、绿色低碳、配套完整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加快建设5G网络、全国一体化数据中心、国家产业互联网等新型数字基础设施^[19]。完善数字经济相关的准入、审查、监管制度,加强数字经济安全风险预警、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规范数字经济新业态健康有序发展。加强产业链供应链高水平开放,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积极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以“一带一路”为纽带支持企业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合作。

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与传统产业并不是完全隔离的,新质生产力的产业结构升级,既要有质的高端跃进,也离不开实体经济量的长期累积。要积极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改造提升而非简单抛弃传统产业,通过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补齐产业发展短板弱项,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挖掘符合新质生产力要求的产业发展潜能和竞争优势。要坚持把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以先进制造业为重点,促进制造业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融合,大力推动生产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红利向实体经济倾斜,努力营造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发展环境和社会氛围,从根本上缓解实体经济

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切实扭转实体经济的“空心化”趋势。

(三)发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治理效能

研究新质生产力,不能孤立地仅仅就生产力谈生产力,而要自觉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视角,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内涵要求,提出发展对策。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独特优势,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制度支撑和体制保障。因此,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在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切实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持久转化为良好的治理效能,促进有利于新质生产力形成发展的各项要素竞相迸发、充分涌流。

要巩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依托国有经济带动国民经济各行各业的良性发展。要通过深化国有企业分类改革,更好体现国有经济服务于国家战略的功能定位与使命要求,推动国有经济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基本公共服务等关键领域集中,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的先锋队和压舱石作用。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财政、货币、投资、消费、就业、环保等各方面政策协同并进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

推进新质生产力形成发展,归根到底是要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实现共同富裕。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初次分配及再分配领域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坚决堵住以权力、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获取非法收入的渠道,守住社会公平底线,以共建共治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和谐。针对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创造性破坏效应,积极探索数字经济与人的全面发展相兼容的高质量发展模式。要面向人民美好生活需求,大力发展在线教育、远程医疗、虚拟现实等新型服务消费。积极推动数字技术在行业、地区、群体间广泛扩散应用,通过教育培训塑造劳动者的数字化思维、提升劳动者技能。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对重点、困难人群施以相关政策保护与缓冲扶持,缓解消除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共享鸿沟,使得数字红利更多惠及社会大众。

六、结 语

在人类前行的漫漫历史长河中,从揖别古猿到狩猎采集,从农业定居到工业制造,从深陷马尔萨斯贫困陷阱到东西方大分流,人类文明的每一次进步总是伴随着一系列标志性事件的出现。生产力作为“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构成了人类文明演进的底层逻辑。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逻辑中,未来社会“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20]。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继承与创新,为我们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时代指引。新技术革命时代,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不断孕育的新质生产力,正展现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曙光。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强调 牢牢把握东北的重要使命 奋力谱写东北全面振兴新篇章[N]. 人民日报,2023-09-10(1).
- [2] 蒲清平,向往.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内在逻辑和实现途径——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动能[J/OL].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45(1):77-85. <https://doi.org/10.14100/j.cnki.65-1039/g4.20231017.001>.
- [3] 周文,许凌云.论新质生产力:内涵特征与重要着力点[J].改革,2023(10):2-9.
- [4] 周绍东,胡华杰.新质生产力推动创新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研究[J/OL].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https://doi.org/10.14100/j.cnki.65-1039/g4.20231012.001>.
- [5] 谢璐,韩文龙.新质生产力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11-13(6).
- [6] 王珏,王荣基.新质生产力:指标构建与时空演进[J].西安财经大学学报,2024(1):31-47.
- [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1.
- [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75.
- [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0]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11] 马克思. 资本论: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000.
- [12] 赵敏,王金秋. 资本主义智能化生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6):73-74.
- [13] 杨春学. 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J]. 经济学动态,2021(9):26-28.
-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 新征程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任务与政策[J]. 经济研究,2023(9):4-5.
- [15]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 工业稳增长:国际经验、现实挑战与政策导向[J]. 中国工业经济,2022(2):5-26.
- [16] 郭晗,侯雪花. 新质生产力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的理论逻辑与路径选择[J]. 西安财经大学学报,2024(1):21-30.
- [17] 蔡万焕,张紫竹. 平台经济运行规律及对我国宏观经济治理的启示[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2(6):111-113.
- [18] 翟青. 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研究: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分析[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23:73.
- [19]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208.
- [20]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8.

A Political Economy Explanation of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ZHAI Qing¹, CAO Shouxin²

(1. School of Marxism, LuDong University, Yantai 264025,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China)

Abstract: Marx's theory of productivity lay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understanding the concept of new-quality productivity.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s a multidimensional breakthrough and leaps in the coordination of material and spiritual productivity,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ture, and social progress, and reflects the systematic change of the collaborative evolution of the technical mode and the organizational mode of production. In terms of the composition of production factors,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refers to the emergence of new production factors, the improvement of the supply quality of the original production factor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efficiency of each factor combination. At the level of product and industrial form,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refers to the improvement of product supply capacity to meet people's needs for a better lif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drive and leadership of maj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constitute the outstanding core of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nd give it a distinctive featur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t present, the main problems affecting and restricting the new quality of productivity are centered on the lack of core kinetic energy of maj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 dilemma of macroeconomic governance, and the external impact of the turbulent changes in the world pattern. In the new era and new journey, the new national system of key core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that integrates numbers and realities,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governance of the basic socialist economic system should be taken as the policy priorities and focuses for accelerating the promotion of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Key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maj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digital economy; socialist basic economic system

(责任编辑:任 燕)